

# “科学的”抑或“修辞的”？

## ——再论修昔底德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

吴晓群

虽然，修昔底德的记载不可能没有偏见和不带感情色彩，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和铺陈资料的方式，但这不等于他是在有意虚构事实。他要从收集和记述当代的具体事件中来体现人类普遍的本性和基本处境，这一任务本身蕴涵了极大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但他毕竟尝试和开创了一种观察和写作人类行为和言说的方式，力图避免虚构和夸张，取证于人类自身的具体事实。

修昔底德在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他被称为“科学和批判历史的奠基者”、“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等等。然而，20世纪后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却通过分析其著作中大量演说辞以及一些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提出了和以往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修昔底德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创作，在其中更多地是带有修辞的成分，而非所谓“理性的”或“科学的”。那么，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究竟是“科学的”还是“修辞的”？这一问题不仅关乎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更是如何解读古代史家及其著作的关键。

### “科学的历史学家”：《战史》的真实性问题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的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一场大战，战争连绵27年之久。修昔底德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材作为其历史创作的对象，据他自己说是因为：“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这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I.1）

事实上，这场战争不但对当时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对历史学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被认为是第一次科学地、历史学地被记录下来战争史实。

修昔底德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主题，按时间顺序记述战争的过程。他的著作实际上就是一部专门讨论战争的起因、

经过和结果的著作，在书中他告诉了我们有关战争的一切，而几乎将与战争没有直接关联的内容全部排除在外。长期以来，学者们基本上一致认为，修昔底德以理性的态度描写了战争中的事件和人物，英国著名史家伯里说，他的历史书写在“古代世界树立了独一无二的准确性的标准”。

修昔底德说：“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到我的结论时，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传说中的每个细节。普通人常常容易不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I.20）这段话通常被认为是修昔底德方法论的陈述，这样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于现代史家来说也莫过于此。这话同时也表明，他意识到要记载真正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必须以更严谨的方式来写作。遵循这一方法，修昔底德力图准确、真实、客观地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确，与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对历史的分析更有“人性”的色彩，也更具“理性”。在解释历史事件时，他没有归之于简单的偶然因素或神秘因素，而是致力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探索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力图透过表面的现象来分析问题的实质。

比如，对于雅典，修昔底德指出，当雅典城邦一旦获得统治希腊世界的权力，他们会发现，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随意放弃的，如果放弃，他们新的生活方式也将毁灭。正如伯里克利所说：“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II.63）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已改变了它最初存在的原因，即由最初的害怕被别人统治，到随后的为了荣誉，最后则是利益的需求。由此，修昔底德用恐惧、荣誉和利益分析了雅典帝国存在的理由和它的必然性。

总之，在修昔底德对事件的分析中，我们已经难以找到

任何不可违抗的天神的意志，也没有不可捉摸的宿命的观念，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他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也很少将事件的发生归之于偶然性或表面富丽堂皇的理由。由此，修昔底德不仅在古代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的形象，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家对他更是推崇备至，他被认为是古典史家中“最具现代性的”、是“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等等。他所创立的政治军事史的史学范型为西方史学家纷纷效仿，特别是到了19世纪西方历史学专业化的时代，更被德国史家兰克及其学派奉为主臬，成为西方传统史学的模式。直到20世纪初，他仍被认为是“科学的”历史学的先驱。

不过，除了在第一卷中，修昔底德曾提及他的资料来自亲身经历和目击者的证词以外，他几乎再也没有说明他资料的来源。尽管如此，他著作的真实性在古代及近代一直没有受到过怀疑。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得到真实和客观的呢？事实上，在当时并无任何战地记录，今天也没有其他可证明其真实性的参照，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他不可能做到对整个战争的记载都完全真实。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事情的记载是有选择性的，比如他并未提及提洛同盟中各盟邦需要缴纳的经费是多少，而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他还在书中13处引用了当时的文献（主要是在第8卷中），可见他是可以找到一些文献的，但他并没有充分地加以运用，如对一些重要的合约就不曾提及。

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随着兰克史学的衰落和各种新的史学流派及思潮的产生，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采用更具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修昔底德作品中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少西方学者从修昔底德偏爱使



修昔底德头像

用的演说辞出发，通过分析演说辞的风格、结构和所要揭发的主题对此前关于修昔底德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 “修辞学家”：演说辞的运用与戏剧性的情节

众所周知，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双方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演说辞，据统计，全书共出现了141篇演说辞。其中以政治演说为主，如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辞就有30篇，而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上的演说辞也有17篇。当然除了政治演说辞以外，修昔底德还收集了一些战前动员的演说辞，如两军对峙时双方统帅对自己士兵的演说以及葬礼演说，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是否具有史料价值，长期以来存在着极不相同的看法，完全相信者有之，基本怀疑者有之，而学者们的争论皆来自修昔底德自己的一

段话，他说：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辞，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I.22）

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辞可能是他亲耳听到的，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有些则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但不管哪种情况，作者都力图使那些演说辞与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全书的情节发展保持一致，使之浑然一体。且由于书中的演说辞除说理精辟外，还十分讲究辞藻，反复铺陈，可以想见他是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写作那些不同人物在各种场合所使用的演说辞的。这就引发了众学者关于书中的演说辞到底是修昔底德的“发明”、是一种文学性的创作，还是历史真实的大讨论。

抛开学者之间的争论，回到古代希腊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知道，在城邦时代，公开的演说是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演说的过程中，通过公民间的互动，构成了城邦的集体记忆。演说辞可被视为一个共同体共同的经验、共同的记忆。尽管在细节上会有差异，但演说辞更强调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集体记忆。由于当时的许多听众曾经亲身经历，对演说辞的内容仍然十分熟悉，甚至他们知道的细节可能比修昔底德知道的还要多，据此判断，修昔底德不太可能完全靠编造来充实他的写作，只有当他所记载的演说辞的内容符合人们的集体记忆时，才能保证他自己反复强调的真实性。而且，如果演说辞是为了迎合某些人杜撰出来